

相距六百年，兩場疫情的信仰比較

楊孝明

訓道者曾言：太陽之下，決無新事。自古以來，困擾人類的，主要是饑荒、瘟疫、貧窮和戰爭。在廿一世紀，雖然人類的科技躍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饑荒、瘟疫、貧窮和戰爭仍如影隨形，緊跟著人類的腳踪。

2019 年底出現的新冠肺炎，全球人類奮戰年多，至今仍未平息，不禁使人想起十四世紀的黑死病。鑑古知今，究竟黑死病對當時的社會及天主教會造成什麼的影響？

黑死病其實是鼠疫。黑死病在歐洲正式爆發是 1346 年，但在傳到歐洲前，已在中亞地區爆發，當時教宗克萊孟六世得到報告，在中亞到遠東地區，已死 23,840,000 人。可惜，當時醫學界還未發展出傳染病的概念，所以歐洲沒有預防，也不感到驚恐。1347 年，熱那亞商船進入西西里島，已將鼠疫帶入。後經馬賽滲至法國，傳往北非及西班牙，再傳往英國、義大利、瑞士及匈牙利，整個歐洲失守了。最後，遠至格陵蘭也受波及。俄羅斯是最後在 1351 才受波及。最奇怪是波希米亞，即今天的捷克地區，沒有受感染。全球死亡人口達七千五百萬。單是歐洲估計便死了二千多萬人，但實際上確實人數，沒有人知道。一般估計是三分之一人口。

據前人的歷史記載，這種疫症是一種鼠疫桿菌，寄生於老鼠或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這些小鼠生活在輪船上，由中國開往中亞、印度、中東而傳到歐洲。但是，近人考證，認為這疫症的源頭不是中國，而是中亞南部某地區，隨著沙漠商隊傳播。

高死亡率當然是令人感到恐懼的主因，另一樣使人覺得恐懼的，是因為人們不知疫症的源頭或真相。當時的人完全沒有懷疑熟識不過的老鼠或跳蚤，根據當時的文獻紀錄，完全沒有提及這兩種東西。時人對傳染病的認識近於無知。

當瘟疫嚴重到一個地步，人類的能力完全無能時，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在黑死病時期，人類的恐懼，令到大家都只顧著生存。一位方濟會修士說，連神父也不做臨終傅油及聽臨終告解，這令到當時民眾大感絕望。在坎特伯雷，一位教士報告了英格蘭的神父們也是這樣，「不履行職責照顧教友，不能令教徒擺脫死亡的恐懼。」整個歐洲，都有父母拋棄孩子以及子女拋棄父母的記錄。教宗的醫生居伊·德肖利亞克也記下了：「父親不探望兒子，兒子也不探望父親，仁慈已死。」雖然人性冷酷佔大多數，但在巴黎，也有修女「不怕死亡，親切溫和，謙卑恭敬地照看病人。」新來的修女不斷接替死去的修女。在這裡，少數人閃耀人性的光輝。

當人們無法知道病因，也無法阻止疾病時，便產生兩種極端反應。第一種是縱慾。當看到富人和普通人都瞬間死去，很多人決心及時行樂以及不理會是否犯法。人們不擇手段，謀殺、施巫術、通姦、偷盜……已經沒有了道德良心的底線。第二種人認為瘟疫是天主的作為，為了平息天主的震怒，有城市立例禁止一切認為是犯罪的行為，例如賭博、詛咒、酗酒。同時，亦有遊行懺悔禮，這些禮儀有時長達三天，懺悔者披上麻衣，向四周撒灰，哭泣，祈禱，揪頭髮，鞭打自己，高舉有聖母聖人的聖龕，祈求憐憫。

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做法，就是醫生們都戴一種鳥形的面具。這叫鳥人裝。長袍塗上蠟，阻礙飛沫和血液的接觸，而鳥喙

嘴則好像防毒面罩，和患者保持一個距離。中世紀的法國預言家及醫師諾斯拉達姆斯都以這裝束出現。

面對大瘟疫，人們不知疾病來源，也試過用不同的方法處理，例如不同的醫療方法，甚至巫術也運用。這情形下，出現了恐懼、悲傷及憤怒等情緒。為何會憤怒呢？其實想深一層，就是對天主的憤怒。因為人們認為這是天譴，是天主對人類敗壞的懲罰。既然是天主的力量，當然不敢對天主發怒，所以便把怒氣向別人發洩。而當時最方便發洩的族群，就是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便被指控在眾人水井中下毒，導致黑死病的出現。猶太人為何要這樣做？他們說猶太人想毀滅天主教，統治全世界。另外，由於猶太人的習俗，令他們很衛生，死亡率自然少，人們便懷疑他們。於是，在第一波瘟疫後，人們便用私刑攻擊猶太人。最初的地區在納博訥和卡爾卡松，猶太人被人拖出自己家門，被燒死。

猶太教和新興的天主教存在敵意，最早可追溯至公元 70 年。羅馬人在公元 70 年毀滅了耶路撒冷聖殿，猶太人再沒有聖殿，他們需要思考沒有聖殿後的猶太教如何生存。猶太人在雅木尼雅召開大會，確立他們的宗教，其中一項條文便是對抗「異教徒、背教者和自以為是的人」，這實際上是指基督徒。自此，猶太教禁止基督徒參與猶太教的祈禱，在此之前，宗徒們有在會堂中參與猶太祈禱。

其後，聖史撰寫福音，便對猶太人，特別是法利塞人存有敵視。在瑪竇福音中，作者特別說出，猶太人要為耶穌的血而付代價。當比拉多洗手，說出自己不負這責任，猶太人大叫：「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瑪 27:25) 聖史刻意寫這一段福

音時，已過了公元 70 年。這就是說，猶太人要為基督徒的救世主之死負責。

後來，當天主教逃過宗教迫害，最終成為羅馬國教時，教會便頒佈剝奪猶太人公民權的法令。金口若望將猶太人斥責為殺死基督的人；聖奧斯定則宣佈猶太人為「被放逐者」，因為他們不接受基督的救贖；十字軍東征前，也曾對猶太社區進行屠殺；教宗依諾森三世於 1205 年宣佈，因謀害基督，猶太人要永世受奴役。這位教宗其後在 1215 年頒佈法令，要猶太人配戴徽章，用以將他們隔離；聖多瑪斯也說：既然猶太人是教會的奴隸，教會便可剝奪他的的財產。所以，後來黑死病大爆發時，人們將怒氣發洩在猶太人身上，便顯得很合理。

在黑死病期間，對猶太人第一次審判在 1348 年進行，在薩伏伊羈押時，猶太人的財產全被沒收了。審訊時用了酷刑迫供，要他們作出自己的罪及作案情況，11 名猶太人被活活燒死。這樣的審判及認罪方式，很快便傳往別的區域，在亞爾薩斯、瑞士及德意志地區，引發另一輪的攻擊。

教宗克萊孟六世身在亞維農，仍在 1348 年 9 月發出一份敕令，說這種行動的教徒是「受到那個說謊者，即魔鬼的引導」，指控猶太人落毒、對猶太人大屠殺，是「可怕的事情」，教宗指出，瘟疫在折磨任何人，包括猶太人。教宗要神職人員像他在亞維農一樣，保護猶太人。但是，教宗的聲音被淹沒在眾人的邪惡指控中。1349 年 1 月，在巴塞爾，有數百個猶太人被燒死。2 月，史特拉斯堡有兩千名猶太人被帶至墳場，若不皈依做基督徒的，全被燒死。

瘟疫久未停息，社會上終於出現一群名為「苦修者」的人，二三百人甚至上千人，他們組成團體，由一座城市遊行至另一座城市，裸露上身，用有刺的皮鞭打自己，用來表達懺悔，希望誘使天主原諒人類的罪過。當鮮血流出，他們便認為可彌補人類的邪惡，為人類贏得另一次救贖的機會。他們沿途大呼基督和聖母的名字，呼求天主「寬恕我們」，他們自視為救贖者。而旁觀的市民則在一起哭泣及嘆息。這些人由一個世俗的「大團長」組織起來，每天三次遊行，團員要服從大團長的命令，不得洗澡、更衣、睡在牀上等。後來，這些遊行被某些人指為放蕩，而這些放蕩的行為，往往結合性和鞭苔。

他們在德意志、法蘭德斯、皮卡第，最遠去到蘭斯。他們的隊伍有數百支，在遊行中呼叫、鞭打自己、頌唱讚美詩，聲稱若不是他們，基督的王國便會滅亡。而各地的居民，則以崇敬迎接，讓他們食宿，帶兒童讓他們治療。在記載中，他們令一個兒童復活。人們用衣物染他們的鮮血保存著，當作聖物。逐漸地，各種人都加入遊行隊伍，包括兒童、婦女、騎士，甚至神職人員及修女也加入。而婦女則為他們製作華麗的旗幟帶著巡遊。

再進一步，這些團體向神父和教會發出挑戰，讓自己成為天主與人類間的居中角色。大團長竟然聆聽人們的告解、進行赦免或強迫人悔過。反對他們的神父，被砸石頭、被斥為反基督者。這些苦修者，在大團長帶領下，佔領教堂、擾亂彌撒、嘲笑聖體、搶劫聖堂。他們聲稱有能力驅走疫魔，使死人復活。同時，這班苦修者也把暴力指向猶太人，而其他市民就跟隨著，叫喊著要向「水井投毒者」報仇。很多猶太人遭到屠殺。

1349年3月，在沃爾姆斯的一個猶太社區，400人在家中自焚，他們情願自焚也不願被敵人殺死。法蘭克福也發生了這樣的

自焚。在科隆，政府重申教宗的論點，說猶太人也死於瘟疫，但苦修者們聚集了一大群人，繼續他們的行為。

猶太人不斷被迫害屠殺，最後，他們選擇了自衛，用積存的武器，殺死二百多名暴徒，但結果是招至更大的報復，瘋狂大屠殺。1349年8月24日，有六千猶太人在美茵茲被殺，三千多人在埃爾富特被殺。最後的大屠殺在1349年12月，安特衛普、布魯塞爾及整個德意志地區，完全沒有猶太人生存下來。

這一刻，教會和政府終於決定要鎮壓苦修者，地方官員關閉城門，不准他們進城。教宗克萊孟六世在10月發出一封召書，號召要遣散和拘捕苦修者。地方政府開始追捕苦修者的大團長，把他們斬首或問吊。於是，一眾苦修者便四散逃走，「消失得無影無蹤，突然就像他們來時一樣」、「就像深夜的幽靈或騙人的鬼怪」。還有一些苦修者在各處遊移，要到1357年，才徹底消失。

在古代，任何天災，人們都會賦予信仰的意義，不會單純地認為是細菌病毒，因為那時世人還未認識細菌病毒。所以，人們要問，黑死病有什麼意義？是天主要警告世人離棄罪惡，痛改前非？就像諾厄時代一樣？若真是這樣，天主的目的達不到了。因為，瘟疫後，人們比以前更邪惡、更貪婪、更喜訴訟、更好戰，而奇怪的是，這情況在教會中最為明顯。

1350年，是克萊孟六世第一次訂教會不在00年作為大赦年。但可惜，教宗將這罪赦與金錢掛上關係，說明通過向教會奉獻金錢，任何人可購買這教會的赦罪寶庫。當然，後來的發展人盡皆知，就是贖罪卷了。克萊孟六世雖不是聖人，但他卻並不太壞，教會中的神職，比起他來，可能壞得多。1351年，這些神職竟然

請求教宗廢除行乞修道士教團，亦即方濟會。克萊孟六世這樣憤怒地回應：

「你們又如何向民眾佈道？假如論及謙遜，你們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人，自吹自擂，狂妄自大，揮金如土。假如論及貧困，你們是如此貪婪，以致全世界的有俸聖職都滿足不了你們。假如論及純潔——可我們將對此閉口不談，因為天主知道每個人的所作所為以及你們中有多少人滿足了自己的色慾。」從教宗的發言中，可知道神職在瘟疫中的反省很有限。

更可怕的是，因為神職嚴重不足，死了很多人，故此，教會成批地任命神父，當中不少是失去妻子和家庭的人，投身聖職是作為避難所。這些人幾乎沒什麼文化，也許認得一些字，卻不明白其意思。坎特伯雷大主教說這些神父「受到無饜足的貪婪影響」，收取額外的費用，而無視人們的靈魂。

人類，似乎還停留在純肉體的狀態，沒有進化到發現靈魂深處的秘密。

今天，2021 年，人們又從新冠肺炎學會了什麼？和十四世紀不同，今天很少人認為這疫症是由天主而來的天譴。反而因為疫症的可能源頭是武漢的海鮮市場，一些環保人士比宗教信仰的人更熱心地指出，人類的消費模式是否應該改變？大自然的承受力始終有限，現在是一個明顯的警告了。天主教或基督宗教方面，比起十四世紀，今天很少人認為這是天主的懲罰，反而會認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是否應要改變。

在古代，疫症令人更熱中信仰，或以一種更偏激的方式表達信仰，因為，古代人認為疾病和天主有關係。而現代人，因為醫學發展的緣故，將疾病和天主的關係割斷了。連帶疫症，也很少

人認為是天主懲罰人類。不過，教友們有否因為疫症而更思考生死，改變自己的信仰行為呢？這種情況，在美國似乎較為明顯。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令四分之一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更趨強化，而這現象，在歐洲或其他亞洲地區似乎看不到。即使是香港，我們無奈下參與網上彌撒，但人數似乎在下降中，而當有實體彌撒時，人數也不能和以前相比，有些教友似乎選擇了網上的模式，聖堂擔憂要有1.5米距離，很難承載原有的人數，結果是，人數反而少了，這代表了什麼？值得我們反思。當然，像中世紀「大團長」那些行為，在全世界也看不到，最極端只是韓國一些基督新教，堅持以萬計的人聚會，結果因此而爆發更大的疫情，聚會也終止了。

兩個疫症，相距六百多年，但人們思考的模式似乎轉變了，中間經歷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世俗主義進入了我們的思考議程。人們將疾病和天主的關係割斷了，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一方面看，應是人類的進步，不會迷信於疾病和天譴有關係，能夠更科學地去理解身體、疾病和醫學。而且，也不會隨便因疫情而仇視任何群體，即使早期有人想鼓動仇視華人的情緒，也不成氣候。這是值得高興的。相比起中世紀，因應疫症與信仰的掛鉤，所以才會出現「大團長」這種模式。

但另一方面，人類的各方面的發展，似乎更不考慮「神」的角度。例如基因改造、複製物種、複製人等。或是其他倫理抉擇，例如墮胎、安樂死、人工授孕等。

其實，今天教會並不反對科學研究或創新科學應用。但是，在科學日新月異的同時，我們人類是否有尊重大自然，欽崇天主在萬有之上？還是認為人類已掌握了一切，甚至可以像哲學家

般，宣佈「神」死了？一位天主教科學家在研究疫症病毒時，知道病毒的出現，並不是天主的意思，但又怎樣平衡作為一位教友，天主仍然掌管宇宙這思潮？

德日進神父是古生物學家，他發現北京人頭骨，通過古化石，令他接受了物種進化的理論，但同時，德日進是非常清晰知道，人的存在根基就是天主，進化論和天主本身並無衝突。

比利時天體物理學家喬治·勒梅特，同時是神父，是第一位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論。但這也沒有減損勒梅特神父對天主的信仰，天主就是宇宙的根源，科學越進步，就越能認同於天主的信仰，因為越接近奧秘，越清楚人類的渺小。

在疫症橫行的今天，我們又怎樣去反思自己的信仰？